

在这种情形下,评估搞得越多,“学术”含量丧失得越多越快。

陈平原教授让大家多提改进的建议。如何改进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学术评估是学术体制和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市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之下,权力的介入和主导也是必然的。要想改进,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但无论从那个层面,我们都应该考虑这样几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定义。学术是什么?学术评价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促进、提高学术,而不是损害学术、异化学术。如果评估的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说明评估机制出了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学者是什么?做学术需要人,也就是教员或学者,这些人是学术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但他们在现有评估体制的左右下,成为了权势、表格、短暂虚名的奴隶。有人成了“学阀”,更多的人则成了“学奴”。我们都知道,仅凭权力和金钱,而没有知识和学术的创新,中国不可能崛起,至少不可能持续而有质量地崛起。学术评估的最终目的是帮助、鼓励和保护学者,使他们把做学问看成是一种很神圣的事业,并甘愿为此皓首穷经也在所不惜,而不是将他们变成欺世盗名、坑蒙

拐骗、趋炎附势、尔虞我诈的人。在目前这种学术与权力相结合、学术为利益所驱动的大环境下,学者很难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一代学者的异化,所带来的结果不光是知识的断裂,更是精神和风骨的丧失,数代人都难以补救回来。而中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和平崛起时代,需要一大批真正的学者,无论如何是承受不起这个代价的。我很赞成唐磊教授的意见,我们应该从一种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改进学风要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才有希望

王建民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谈几点感想。我主要是针对我所从事的专业和相近专业有感而发。我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方向。再扩大一点,政治学等都能涉及到。此外,我还主编一份专业期刊,稿件选题广泛,这也迫使我有时到邻近的学科看看。我谈到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与我距离较远的学科,我不清楚。

总的说,我很悲观。就我观察的范围,抄袭剽窃率非常高。我估计,硕士生的大部分有程度不同的抄袭剽窃行为。这个判断有两个依据:当硕士生导师、

学术对话

博士生导师多年,凡是我参评过的论文,不论来自我们自己的学科点,还是来自我以各种名义参评的其他学校、其他学科点,真正干净的很少。博士论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想,这么多年,这么多学校和学科点,有问题的论文恰巧都让我撞上,这可能吗?我的幸运几率不可能这么高。我只能推断,其他参评者有同样际遇。因此推断,问题是普遍的。第二个依据来自学生的反映。他们的反映是比较可靠的。其实,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而是公开的招摇过市了。

刚才说的是学生,但是板子不该首先打在他们身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不干净,很多情况下是导师自己不干净。有些导师自己干净,但缺乏责任感,没有对学生、对学术负起责任。

见过斯文扫地,但没见过斯文如此扫地的。何以至此?科研的量化评估似乎难辞其咎。我想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首先,数量评估是必要的,欧美的大学里也有量化评估制度,但并没有造成我们这样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可能是评估指标、评估方法等是否合理,而不是取消量化评估本身。其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你让政府机构来评估,特别是让它制定评估标准,除了量化,没有别的办法。你当部长、当校长,让你

订标准,你也只能这样。政府机构的评价标准,其性质本来就不是学术的,它只能是量化的;学术标准只能来自同行专家,而且常常是见智见仁。

“法不治众”原理可能是一个解释。当抄袭剽窃成了大众运动,不是小众行为,无论怎么批评、处罚,都只是抓几个倒霉的,于大局无碍。关键是这个“众”字。是个学校就要叫大学,甚至还要叫研究型大学;是个教师就要考核他的科研,满大街都是教授。大大小小的学术市场遍布海内,别说不想管,就是想管也管不了;蔬菜品种就那么几个,不让许多人卖同一种菜,很难。山东有一位叫杨曾宪的学者提出,不治理人海学术,不“裁军”,中国学界的乱象治理无望。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

我感觉,我涉猎的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好像比其他学科中的问题要严重些。在我观察的相关领域里的学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主要是意识形态宣传,严格地讲那不是学术。宣传与学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学术研究要求有独到见解,要求创新,要求独辟蹊径;宣传恰恰相反,形式可以花样翻新,但内容不能走样,而且要铺天盖地。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绝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规范。因此,人们也把抄袭剽窃不当事,甚至认为是正常的。我在上世纪70年末

80年代初的大学里见过这样的情形：图书室资料员帮助老师编教材，就某本图书买上几个复本进行剪裁，按照编者的要求往稿纸上粘贴，书稿乃手写加粘贴物拼凑而成，所谓剪刀加浆糊也。后来见到对抄袭剽窃的批评，他们大为不解，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觉得这种事一直是公开做的，而且是家常便饭，怎么忽然就不对了呢？现在回忆起来成了笑话。胡为雄先生曾经在《学习时报》上谈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各高校自编哲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类教科书在全国有数千种！仅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400本左右。如此规模的重复，怎么可能不抄袭？

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形成学术规范并使学者遵守，前提是形成学术共同体。我们没有学术共同体，有的是一个亚官员共同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个官府而不是学府：这里鲜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当面批评，公开争论，低能者止步，违规者出局；通行的是官场规则：官本位，以下媚上，相互庇护，相互补台，相互提携，相互吹捧，至少是互不得罪，你好我好大家过年。

这种学府的官府化，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大学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访问过国外许多大学，它们与政

治之间的距离很近，甚至是零距离，但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不那么紧密。我们不一样。一方面，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大部分在政府手里，这使我们的大学不得不尽其所能博取政府青睐；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在该国历史上和政治上有过中国的大学那样的影响：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对“文革”有印象的人都记得，当时的“梁效”（清华和北大）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多么不可一世。大学的这种特殊作用，也使得政府不能不产生把大学紧紧抓在手里的冲动。处在这样一种与政府的关系中，大学或多或少地成为政治机构延伸，怎么可能不行政化、官府化、官场风气弥漫？由此观之，学风的改进是同学术体制、大学体制乃至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困惑与期待

李秀清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刚才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深有同感，也很有启发。我在高校里面待了这么些年，从助教到教授，现在还在负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的工作。联系自己的工作情况，我想讲两个困惑：一个就